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陈平原 著

---

# 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

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---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学 | 本 | 史 | 丛 | 刊

第三卷 第三

# 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

——以史学为中心

钱宾四

上海三联书店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陈平原 著

---

# 中国现代 学术之建立

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---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: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/陈平原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.2

(学术史丛书/陈平原主编)

ISBN 7-301-03592-6

I. 中… II. 陈… III. 文化—学术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G0-06

书 名: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 著

责任编辑: 张凤珠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3592-6/G·436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开本 23印张 353千字

1998年2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3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## 学术史丛书书目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中国禅思想史<br>——从6世纪到9世纪       | 葛兆光 著     |
|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                 | 阎步克 著     |
|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               | 王 瑶主编     |
|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<br>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 | 陈平原 著     |
|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                | 王永兴 著     |
|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                 | 赵 园 著     |
| 儒学南传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何成轩 著     |
|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                | 郭双林 著     |
|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              | 陈平原主编     |
| 文学史的权力                     | 戴 燕 著     |
| 《齐物论》及其影响                  | 陈少明 著     |
|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              | 陈国球 著     |
|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                 | 夏晓虹 著     |
| *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            | 陈泳超 著     |
| *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          | 蒋述卓等 著    |
| * 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                | 陈平原、王德威主编 |

## 文学史研究丛书书目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                    | 孙玉石 著          |
| 小说史：理论与实践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平原 著          |
| 上海摩登<br>——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—1945 | [美]李欧梵 著 毛 尖 译 |
| 北京：城与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赵 园 著          |
|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平原 著          |

# 作者小传

陈平原,1954年生,广东潮州人。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。1997年3月至7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》(1987)、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(1988)、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第一卷(1989)、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(1992)、《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》(1993)、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(1995)、《陈平原小说史论集》(1997)、《陈平原自选集》(1997)、《中华文化通志·散文小说志》(1998)等。治学之余,撰写随笔,借以关注现实人生,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,结集有《阅读日本》等六种。另外,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,1991年起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《学人》。

## 目 录

- 导 言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/1**
-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/2
  - 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/7
  - 三 走向专门家之路/10
  - 四 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/15
- 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/21**
- 一 “学在求是,不以致用”/22
  - 二 “殚精考索”与“兴起幽情”/32
  - 三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/40
- 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/53**
- 一 “劝学”与“学隐”/54
  - 二 “学在民间”之自信/62
  - 三 书院讲学的魅力/71
  - 四 教学弊与扶微业/77
- 第三章 学术与政治/88**
- 一 参政与回向/89
  - 二 保国或著书/95
  - 三 讲学复议政/103
- 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/118**
- 一 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/119
  - 二 “具有广博学识”的专家/123

- 三 “博学的人”与“国人导师”/128
- 四 从“开山斧”到“绣花针”/132
- 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/141**
  - 一 从“大胆假设”到“小心求证”/143
  - 二 双线文学观念/147
  - 三 历史演进法/154
  - 四 《红楼梦》自传说/160
  - 五 整理国故思潮/167
- 第六章 关于经学、子学方法之争/183**
  - 一 “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”/184
  - 二 《庄子》的挑战/186
  - 三 清儒之得失/189
  - 四 章、胡之戴震论/192
  - 五 对于“汉学”的推崇与超越/195
  - 六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? /200
- 第七章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/210**
  - 一 游侠之“逍遥法外”/211
  - 二 “中国之武士道”/216
  - 三 对于流血的崇拜/220
  - 四 暗杀风潮之鼓吹/224
  - 五 联络会党的策略/229
  - 六 大小传统之沟通/233
- 附录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——章太炎的学术品格/244**
- 第八章 现代中国的“魏晋风度”与“六朝散文”/251**
  - 一 被压抑的“文艺复兴”/253
  - 二 逐渐清晰的文学史图像/260
  - 三 师心使气与把酒赏菊/268
  - 四 乱世中的“思想通达”/279



五	“谬种”与“妖孽”的不同命运/286
六	千年文脉之接续/293
<b>第九章</b>	<b>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/308</b>
一	学者为何自述/310
二	自传与自定年谱/315
三	“我与我的世界”/320
四	“诗与真”的抉择/325
五	“忏悔录”之失落/330
六	“朝花夕拾”与“师友杂忆”/336
	<b>主要参考书目/348</b>
	<b>后 记/360</b>

## 导 言

#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

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 
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  
走向专门家之路  
章、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

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，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。原因在于，“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”。正如侯外庐所说的，章氏对于周秦诸子、两汉经师、五朝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，均有详细的论述，不难从其著作中整理出一部“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”<sup>[1]</sup>；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，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，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。其实，作为一代名篇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<sup>[2]</sup>。

晚清那代学者，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，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，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，希望借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。同样道理，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，重提“学术史研究”，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。因此，首先进入视野的，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“二

十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没有章、梁“从头说起”的魄力，自是深感惭愧；退而集中讨论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”，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。表面上只是接过章、梁的话题往下说，实则颇具自家面目。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，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，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，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。这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，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。

##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

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(Thomas S. Kuhn)的科学革命理论,解释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<sup>[3]</sup>,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。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,所谓“典范”或曰“范式”(Paradigm)的建立,有广狭两义,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的改变,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,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,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。依照库恩的思路,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:典范的建立—常态研究的展开—严重危机的出现—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,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。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“必要的张力”,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;可对于史家来说,最为关注的,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、新范式即将浮现的“关键时刻”<sup>[4]</sup>。依余先生之见,“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‘五四’前夕恰好碰到了‘革命’的关头”,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又恰好提供了“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”,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。<sup>[5]</sup>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,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。倘若辅以王国维、梁启超的思路,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“关键时刻”。

在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中,王国维以“国初之学大,乾嘉之学精,道咸以降之学新”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。此说常被论者引述,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。其实,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,因“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,而其所以切今者,亦未必适

中当世之弊，其言可以情感，而不能尽以理究”。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，王国维也是“其忧世之深，有过于龚、魏；而择术之慎，不后于戴、钱”。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，乃章、梁、沈、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，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，便是：

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，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，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<sup>[6]</sup>

并非只是“旧学邃密”，更难得的是其“新知深沉”，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，实在不可低估。沈、王诸君，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，走出“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，以图变革一切”的“道咸以降之学”，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。

可与王说相发明的，不妨举出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。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、全盛、蜕分、衰落四期，而衰落期中，必有豪杰之士崛起，其推旧与创新，即导入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，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，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、接引西方学术、回归经世之学，实际上将其视为“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”。如此自我定位，目光所及，在于“开来”，而不是“继往”。正如梁氏所称，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，在于“淆乱粗糙之中，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”<sup>[7]</sup>。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，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，但其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，足证其绝非只是“清学的殿军”。

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，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；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，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。在我看来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，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。即便如此，谈论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，仍能找到不少喜欢“从晚清说起”的知音。

认准“言近三百年学术者，必以长素为殿军”的钱穆，在其名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为康有为专列一章。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，对康氏着墨甚少，因其认定“清末三四十年间，清代特产之考证学，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，而学界活力的中枢，已经移到‘外来思想之吸受’”<sup>[8]</sup>这一思路，在其此

前所撰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已有所体现,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,其贡献在于“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”<sup>[9]</sup>。如此立说,表面上相当谦恭,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。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,康、梁、章、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。

经学史家周予同称康、章为今、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,并断言:“以后便没有大师了,作为经学,至此完结。”<sup>[10]</sup>如此单独摘引,容易引起误解,似乎康、章只属于以经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。实际上,周氏相当重视康、章新见迭现的经学研究对于“新史学”的贡献。比如,将殷周以来的中国史学,分为萌芽、产生、发展、转变四期,而转变期则“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”——周氏此文撰于40年代,断言“新史学”的崛起“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”,最初的动力来自康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<sup>[11]</sup>。经学、史学如此,哲学也不例外。贺麟撰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,称“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潮,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开始”<sup>[12]</sup>。至于使得西方哲学“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”严复,也是康有为的同代人。文学革新方面,康有为影响甚微,但其弟子梁启超之提倡“文界革命”、“诗界革命”与“小说界革命”,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,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。

侯外庐40年代撰写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》时,将17世纪的启蒙思想、18世纪的汉学运动以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作为整体叙述;五六十年代开始酝酿分而治之,80年代因注重“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”,方才明确从百日维新说起的论述策略<sup>[13]</sup>。侯氏的思路颇有代表性:80年代中期以后,晚清社会及学界生气淋漓的新气象,日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,即便不喜欢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”这样的大题目,也都倾向于将康、梁、章、严、罗、王等从清学中分割出来。

不管是章太炎、梁启超,还是罗振玉、王国维,都喜欢谈论清学,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忧世与乾嘉学术的精微。对于清学的叙述成为时尚,并非意味着复古,反而可能是意识到变革的历史契机。假如将蔡元培、钱玄同、胡适、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学人对待清学的态度考虑在内,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现。从宗旨、问题到方法,中国现代学术都将面目一新。之所以谈论清儒家法,很大程度是为了在继承中超越、在回顾中走出。即便主张保皇的

前清遗老(如沈曾植、罗振玉等),学术上也都颇具创新意识,绝非一句“清学的殿军”所能简单描述。晚清以降,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,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,均有目共睹。面对此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学界虽有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之分,但上下求索、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,却是大同小异。

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,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,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“共谋”,开创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。如此假设,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,这里先概述一二,具体的讨论请参见书中各章。

有幸“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诸论”的史家陈寅恪,对其时治经颇尚公羊春秋、治史喜谈西北史地的风气有深切的体会,强调其影响超越专门学问,而及于整个社会思潮:

后来今文公羊之学,递演为改制疑古,流风所被,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,浪漫之文学,殊有联系。<sup>[14]</sup>

相信“学为政本”或主张学术能转移风气的老辈学者,多能领会此中难以实证的奥妙。比如,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“喜为异说而不让,敢为高论而不顾”的说经,一转手而为廖平、康有为,再转手而为吴虞之“决弃一切”——后者已入“重新审查一切价值”的五四时代;钱穆则由晚清学风之“非怪诞,即狂放”,未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“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”,论证何以辛亥革命后几十年,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走上正轨<sup>[15]</sup>。或由经学转为文学,或从学风延及政治,二钱的论述,均不为现代学科设置所限。

“五四”一代学人,似乎更愿意在具体学问的承传上,讨论其与先贤的联系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《导言》部分,胡适高度评价章太炎用全副精力“发明诸子学”且能“融会贯通”,并称“《原名》、《明见》、《齐物论释》三篇,更为空前的著作”。顾颉刚1926年为《古史辨》第一册撰写长篇自序,突出康有为、章太炎的影响;晚年所作《我是怎样编写〈古史辨〉的?》,则强调“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”。类似的论述,如鲁迅怀念章太炎、郑振铎追忆梁启

超以及钱玄同谈论康、梁、章、严、蔡、王等十二子的“国故研究之新运动”<sup>[16]</sup>，均能显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勾连。

后世史家论及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联系，多兼及学业与精神。如余英时称“不但五四运动打破旧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，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、章诸人发展出来的”，以及王泛森讨论章太炎对于钱玄同、吴虞、鲁迅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，均着眼于精神的承传<sup>[17]</sup>；而恰好又是余、王师徒，格外关注胡适、顾颉刚对于史学革命的贡献<sup>[18]</sup>。

不过，倘若由此得出结论，晚清、五四可以合二为一，则又非立说者的本意。周予同在高度评价康、章贡献的同时，不忘强调“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”，理由是，胡适“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，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，来涂饰它”，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确立<sup>[19]</sup>。此说是否过誉姑且不论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胡适那一代学者，确实不为传统经学的家法与门户所限，对西学的汲取与借鉴，也比上一代人切实且从容。

事实上，五四那代学者，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与具体结论，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就以常被论者提及的顾颉刚对康、章学说的借鉴而言，“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份，舍一部份，对康有为，舍的是尊孔的精神，取的是疑伪言论，对章太炎，取的是反孔精神，舍的是章氏对古文经的信仰”<sup>[20]</sup>。而顾氏之所以有此胆识、有此创获，与清末今、古文经学激烈冲突，“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，使得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”有关；更离不开曾出入今古两家的钱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适对“西洋的史学方法”的介绍<sup>[21]</sup>。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，常被论者提及；至于哲学、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，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、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。

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，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，这种论述策略，除了强调两代人的“共谋”外，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。相对来说，上限好定，下限则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，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，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，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

登场<sup>[22]</sup>。另一方面,随着舆论一律、党化教育的推行,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、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,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## 二 “西潮”、“古学”与“新知”

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、颠覆儒学中心、标举启蒙主义、提倡科学方法、学术分途发展、中西融会贯通等。构成如此纷纭复杂的图景,既取决于社会思潮的激荡、个人机遇及才情的发挥,也有赖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。三者兼而有之而且谁也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,则是如何协调“西潮”与“古学”之间的缝隙与张力。

晚清人眼中的“西潮”,一如其关于“古学”的言说一样五花八门。反过来说,每个人心目中的“西潮”,往往与其关于“古学”的定义密不可分。倘就具体学者而言,主张“西学东渐”的,与提倡“旧学新知”的,很可能势同水火;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来说,二者缺一不可。

相对来说,“西学东渐”来头更大,也更引人注目,即便心有疑虑者,也不便公开反对。尤其是从甲午惨败的反省,到五四运动的崛起,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在时贤眼中,“西学”就是“新知”,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,即在于传播并借鉴“西学”。起而抵御西化狂潮的,有极端保守派,但也有自认深知西学利弊,且对中国文化传统持有信心的,比如《国粹学报》诸君。

《国粹学报》第七期上有一宏文,再三论证“国粹也者,助欧化而愈彰,非敌欧化以自防,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”<sup>[23]</sup>。如此曲为辩解,就因为其时的新学之士,已将“欧化”等同于“新知”。但实际上,《国粹学报》“痛吾国之不国,痛吾学之不学”的创刊宗旨,直接针对的,正是此“醉心欧化”的狂潮<sup>[24]</sup>。不妨以主办人黄节、邓实的两篇文章为例。前者称:“不自主其国,而奴隶于人之国,谓之国奴;不自主其学,而奴隶于人之学,谓之学奴”;后者则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,“扬祖国之耿光”,进而实现“亚洲古学复兴”<sup>[25]</sup>。



依此思路,比起推动“西潮”来,复兴“古学”更能获得“新知”。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,可聚集在其旗帜下的,除了邓、黄,还有章太炎、刘师培等一大批重要学者,实在不可等闲视之。

虽然也有“本报于泰西学术,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,皆从阐发”的表态,《国粹学报》依然“以发明国学、保存国粹为宗旨”<sup>[26]</sup>。甲午战败后,时人普遍“观欧风而心醉,以儒冠为可溺”,提倡西学者理直气壮,反而是邓实等人的“摭怀旧之蓄念,发潜德之幽光”<sup>[27]</sup>,显得有点不合时宜。可是,从晚清的《国粹学报》,到二三十年代的《学衡》、《制言》,再到90年代悄然升温的“国学热”,20世纪的中国,并非“西学东渐”一枝独秀。

1923年1月,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创办《国学季刊》,提出“整理国故”的三大策略: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、“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”、“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”<sup>[28]</sup>。这篇由胡适起草的“宣言”,强调“国故”与“国粹”的区别,除了“扩充国学的领域”,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意识。“输入学理”与“整理国故”并重,这本是“新思潮”的重要特征<sup>[29]</sup>;可落实到具体语境,则往往各执一词,互相攻讦。不少新文化人出于对“复古派”的高度警惕,很难认同“整理国故”思潮。像陈独秀那样破口大骂的固然不多,但忧心忡忡者不少<sup>[30]</sup>。实际上,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人,即便日后从事国学研究,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学,成为真正的“国粹派”。

同样“整理国故”,《国粹学报》与《国学研究》的论述策略颇有差异。对前人的思想学说,到底是突出批判意识,还是强调“具了解之同情”,取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。作为西化的代表人物,胡适为了缓和同人的不满,强调自己钻进“烂纸堆”,是为了“捉妖”“打鬼”。将“整理国故”的目的简化为“化神奇为臭腐,化玄妙为平常”<sup>[31]</sup>,这与其极力划清界线的“爱国主义史学”,同样属于“主题先行”。某种意义上,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: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,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。至于具体论述中,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,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。即便如此,本世纪的中国学界,仍以“疑古”而不是“信古”为主流<sup>[32]</sup>。